

城大圖書館

溫帶

城市大學我最熟悉的部份，就是大學圖書館。不用上課的時間，我大都泡在圖書館裏；不用上課的日子，如果我沒事做，也會回到學校，呆在圖書館裏。

城市大學的圖書館想是感謝邵逸夫捐款，所以才命名為「邵逸夫圖書館」。我初入讀城市大學的時候就聽人說過，城大圖書館是全亞洲最大的單層圖書館。圖書館的確很大。大學的校園教學大樓是一座七層高的巨型建築物，圖書館佔了整個建築物的第三層。從圖書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就算急步走，都要一兩分鐘才走完。大學的大門，一般稱為紅門，推開紅門，就可以見到圖書館的入口，由落地玻璃組成的大門，看起來還挺宏偉的。

城大是所很實用的大學，加上位於鬧市之中，本身沒有甚麼自然景觀，宏偉的圖書館自然就成為了所有來參觀城大的遊客的必遊之地了。但是一個十幾分鐘的圖書館之旅，遊客只能跟著導遊到各個地方看一看，得到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，不可能真正領略到圖書館的滋味。

我的本科是翻譯，愛好文學，進入了圖書館，我往往向右走，經過了當期報紙雜誌閱覽區，就到了我最常留連的區域。每當我讀書讀累了，或者剛吃過飯，不想坐下來，就會走到書架中徘徊，這裏拿一本書看看，那裏拿一本書瞄瞄，很容易就打發了一小時。毫無系統地隨意看書，壞處當然是知識不牢固，真正學問沒有多少進展；好處是對於我本行和有興趣的書擺放在哪裏，大概都知道的。每逢同學在圖書館裏找書，我總能像識途老馬般把他們想要的書找出來，贏得同學讚譽，為自己臉上貼金，滿足自己的虛榮心。

圖書館的設計方面有一大問題，就是男廁太少。偌大的圖書館，只有兩個男廁，一個在中間，另外一個在法律圖書館那邊，圖書館的另一端。偏偏我喜愛流連的角落，就只有女廁，沒有男廁。一旦「人有三急」，就要飛奔到中間的男廁。如果不幸有清潔工人在進行清潔，那就要三步併兩步向法律圖書那邊的男廁衝去。每逢這個時候，心裏總忍不住罵，這麼大的圖書館，只有兩個男廁，是怕學生變成書呆子，想訓練學生短跑嗎！

近年來政府削減大學資助之聲不絕於耳，各家大學都「出盡法寶」籌款。城大的「圖書館之友」計劃，可能就是籌款的最新法寶。當然，大學方面自然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法：「城大邵逸夫圖書館成立『圖書館之友』計劃，提供機會讓愛好閱讀人士分享及交流閱讀的樂趣，並善用圖書館的資源。此外，計劃亦希望透過募捐活動，使圖書館館藏更為豐富，協助大學圖書館的學術和研究方面的長遠發展。」從「圖書館之友」的宣傳資料來看，如果成為了城大圖書館之友，就可以使用城大圖書館的館藏資料，和一般城大學生無異。但是成為圖書館之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第一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囊中有錢。圖書館之友的入門價每年約四千至五千元。如果是中學生，就會三折收費。如果想成為終身會員，價錢是「一次過捐贈」(one-time donation)四萬大元，至於榮譽會員，代價是「重大捐獻或捐款」(substantial donation, in cash or kind)。我曾向兩位朋友介紹這個計劃，他們一聽到每年要四五千元，第一個反應都是「痴線！」

「圖書館之友計劃」成立之日，請來了吳斌作嘉賓。據城大的新聞稿，吳斌先後捐贈了

超過八千本書給圖書館。當日有記者訪問吳斌，他打趣說他從前習慣把鈔票插入書本中，方便自己有需要的時候使用，說不定捐贈給城大的圖書中，會有他從前藏起來的錢呢！這段新聞真的可視為《世說新語》外一章，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添上了現代意義。但是我看這段新聞前，已經在圖書館翻過不下數十本Roderick Woo 捐贈的書，但那些書都是乾乾淨淨的，一分錢也找不到。書中自有黃金屋只是讀書人編出來的假話，古今不變。

圖書館有不少書都是有好心人捐贈的。凡是捐贈的書，大都在書的扉頁上貼了一張小紙片，寫明是某人捐贈的。年前過世的著名律師張奧偉捐了不少書。他的書在封面內頁貼了一張鮮花的板畫，寫明這是他的藏書。現在很少人會這樣花心思於自己的藏書上了。

還有一些善心人捐贈的書，可能他們不欲彰顯姓名，就甚麼標記也沒有。這些書在空白頁上往往有送給某人的片言隻語，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書是葉維廉著的《萬里風煙》，這本書於一九八零年出版，在書內的空白頁上，有幾個鐵劃銀鈎的字：「給董橋。維廉」。這本書應該是作者葉維廉贈送給董橋的。一九八零年，葉維廉任教於中文大學，董橋於明報月刊任總編輯。董橋是我心儀的作家，從他的文章來看，他是個重情重義的人，別人贈送的書斷不會隨隨便便轉手送給圖書館。那麼這本書是怎麼樣流落到城大圖書館來的呢？這一本書的背後，究竟有甚麼故事呢？我有時候經過書架，會特地把書拿下來，看著那幾個字，怔怔地想一陣子。

二零零四年的暑假圖書館推出了一項德政。本來圖書館內有幾十個小房間，叫做「教職員研讀小間」，給研究生和教職員借用來讀書和做研究。美國有不少大學的圖書館也有類似的設施，張五常在文章中一再記述，他在洛杉磯加大讀書時，有三年時間是不分日夜地躲在圖書館的小房間裏讀書，為日後三十年來書不觀打下了基礎；李歐梵在芝加哥大學教書時，就長期借用了芝大東亞圖書館的一個有窗

的小房間，課餘就在那裏讀書，一讀就讀了八年。但是看來城大圖書館的教職員研讀小間的使用率看來不是很高，所以今年就把「教職員研讀小間」的「教職員」三個字刪去，容許本科學生借用。初期只容許二位以上的學生借用，最近終於容許學生個人借用。暑假期間我差不多每天都回圖書館借用研讀小間讀書。

本科學生只可以借用靠近宗哲類圖書那邊的研讀間，研讀間大概有六尺乘八尺那麼大，處身其中，不會有窒息的感覺。房間裏唯一的裝飾，是牆上貼的兩張不許這樣不許那樣的規條。此外只有一把椅子和連著牆的桌子。在一無所有的房間裏，人似乎可以更加集中精神，專心於面前書本。

相比張五常的加大圖書館研讀間和李歐梵的芝大圖書館研讀間，城大圖書館的研讀間的規矩未免太多：不可飲食；未辦理過借書手續的書不可以把圖書館的書帶進研讀間；每天都要先登記才能使用，每次只能借用兩至四小時，然後要再辦手續才能繼續使用。張五常和李歐梵的研讀間都是長期借用，他們可以隨時進入，可以把想要的書籍搬進去，張五常的研讀間內甚至有發熱棒，可以把罐頭湯弄熱以解飢渴；李歐梵的研讀間內甚至有一個小書架，而書架上的書未必是圖書館的。雖然比上不足，但是我已經很滿足，因為我終於在寸金尺土的香港，找到了一方淨土，進入其中，就可以靜靜地專心看書。

入讀城市大學之前，我在樹仁學院讀了四年書，對那裏的圖書館也有很深的感情。樹仁學院的圖書館論面積、藏書數量和使用率都肯定比城大圖書館低，但是樹仁圖書館有一項德政，卻是城大圖書館所無，甚至是其他圖書館也未必有的。在樹仁圖書館的入口，服務檯旁有一排放滿了書的書架，這些書是圖書館已經有複本的，所以擺在當眼的地方，任由學生或職員購買，每本只索價五元。我那個時候嗜書成癖，也不知有多少次蹲在這排書架前仔細地一本書一本書地看，選出一堆自己喜歡的書，然後去付一點兒錢。我在樹仁圖書館買了一套

十三大冊的《沈從文文集》，只缺一冊；三冊《鄧拓文集》；馮自由著的《革命逸史》；喬志高譯的《天使，望故鄉》，一批七十年代的文星叢書和筆記等，成為我藏書的主要部份。

圖書館固然有藏書的責任，但是一些有多個複本的書，也不妨擺出來，廉價售給學生或教職員，一來賺點收入，二來也可以騰出書架，迎接新書。但是售價一定要廉宜，因為在香港只有傻瓜才會喜歡買書藏書，但是天下間那裏會有富裕的傻瓜呢！

書籍除了要花錢買之外，還要找地方藏。新書總是源源不絕地推出，但是藏書之地卻總是有限的。我相信城大的圖書館藏書問題比其他圖書館都來得嚴重。圖書館雖然大，但是相信自落成之日起，實用面積都沒有增加過多少，因為城大位於鬧市之中，不能像中大港大般開山劈石，開拓新的領土，建起新的建築物。城大圖書館對藏書的基本政策好像是來者不拒，多多益善，書籍於是越來越多，很多書架都已經擠得密密實實，不要說不可能再插一本書進去，連抽一本書出來也很困難。於是有些書會橫躺在其他書的頂上。好像去年起，圖書館理把一些書書脊向天排在地上。本來書架之間可容二人併肩而行，算是雙線行人，但是地上鋪了書之後，就變成了單程路，找書的時候還要特別小心，不要踢到地上的書。

把書本俯臥地上，其實對書本，特別是硬皮書不好，因為硬皮書的硬皮往往比內頁大一點，把書本俯臥，書的內頁就會受地心吸力牽引向下墜，不用多久，硬皮和內頁就會呈分離的狀態。在參考圖書館那邊有幾本大型字典，因為書架高度有限，沒法站立在書架上，只能書脊向天俯臥在書架上，久而久之，內頁都已經差不多鬆脫了。

可能圖書館管理員也覺得把書放在地上不是長久之計，所以六、七月期間把書架上的書重新安排過。現在地上再沒有書，徜徉書架中，不用再擔心會踢到書了。

我相信每個圖書館都有書滿之患的問題。電腦技術發展迅速，並沒有減少每年出版的書

籍。空間有限，新書卻是無窮無盡的。圖書館只是拖延了一下問題，過幾年同樣問題一定會重新出現的。我覺得圖書館可以參考台灣中央圖書館的處理藏書的方法。台灣中央圖書館就在中正紀念堂對面，遊客也可以進去，在裏面擺出來任讀者取閱的書籍不多，大部份的書都是放在書倉裏面。讀者在電腦裏查到了自己想要的書的索書號碼，就請圖書館管理員把書找出來。香港中央圖書館也有類似的服務，但是收藏在書倉裏的，好像大都是影音資料、字典和參考書。圖書館或者可以找個地方作書倉，把一部份或大部份的書放在裏面，有學生要求才找出來。

書架上的書給重新整頓過，再走在這些書架中間，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。書架上還是那些熟悉的書，但是位置都不同了。瀏覽經過重整的書架，就像和老朋友久別重逢，容貌雖然因為歲月的消磨而有所改變，但從前的特徵，仍然是歷歷在目。有時還會有意外驚喜，認識了新的書本呢！平常逛圖書館，只會注意最高那兩層書架上的書，而忽略了最底兩層書架的書。書架重整後，部份本來在底層的書給移到當眼的高層，閒逛時，我每每有新發現。咦，原來圖書館連這本書也有！本來我要重新熟習書本的位置，很不方便，但是也認識了不少新書，算是一大得著，真是焉知非福。

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很稱職的，都很熱心助人。但是我想他們未必很熟悉圖書館內的圖書，因為我注意到書架上有些書本給分類到錯誤的主題，流落到錯誤的書架上。更有甚者，是一套內容相同的書給拆開，放在不同的書架上。

一九九零年，香港幾個科幻發燒友李逆嫡和杜漸等籌錢出版了一套《科學與科幻叢書》。這套是以季刊形式出版的叢書，只出版了四期就告終了。《科學與科幻叢書》主要推介當時最新的科技發展和科幻文學。這套書四本卻歸類在三個不同的主題下：Fantasy Fiction Science—Popular Work Cosmology—Juvenile Literature，因此四本書分開在三

個地方。我想無論是甚麼主題都好，最重要的是把四本書放在一起。畢竟在香港，推介科幻文學的書可是比雞蛋裏的骨頭更稀罕的東西，應該放在一起的，令有興趣的同學有機會一窺全豹。

台灣的李敖在八十年代獨力搞過類似的叢書，以月刊形式出版《千秋評論叢書》，他有本領捱了好幾年才結束叢書。叢書的內容以政論為主，圖書館既然懂得把那幾冊《千秋評論叢書》放在一起，那為甚麼硬要拆散那四本《科學與科幻叢書》呢？除了這套書，我知道還有幾本書在分類方面值得商榷的。我不知道的當然還有更多。

我記得在蘋果日報的讀者來函版看過有讀者來函批評，中央圖書館竟然把李敖的雜文集《中國命研究》放在占卜算命類書籍的書架上。後來圖書館館長覆信多謝讀者指正，而且把《中國命研究》放回合適的書架上。如果本文有刊出的一天，希望城大圖書館會從善如流吧！把書籍按內容分類真是件大學問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的。

我從初次認識城大圖書，到現在呆在圖書館的時間比呆在家的時間還要多，也只不過是兩三年之間的事。這幾年裏我用功讀書，日子過得簡單、充實而愉快。有人說過圖書館是知識的墳墓，城大圖書館的確收藏了很多知識，但是一點也不死氣沉沉，反而是生氣勃勃，我朝夕倘佯其間，自覺其樂無窮。

關於城市大學，我的記憶不算很豐富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份，就是關於城大圖書館的。記憶是很奇妙的東西，無形無影，卻又有莫大的力量：歡愉的記憶會叫人欣喜莫名，悲傷的記憶會教人悽然淚下；記憶也是自己的過去，遺忘了，也是自己的過去的死亡。就算沒有遺忘，舊的記憶也容易被新的記憶掩藏。人的腦子就像一個抽屜，一打開，往往只看見最上面的東西。我把關於城大圖書館的零零碎碎的記憶寫下來，也就把形影俱無的記憶賦以實體。以後，這些記憶也不容易被遺忘，被掩藏了。

